

內 容 簡 介

本书是刘玉琴同志对自己童年的血泪回忆。

刘玉琴老家山东，一家八口，被地主所逼：父亲闖了关东，爷爷得了半身不遂，大娘遭地主奸污悬梁自尽，伯父忧愤过度成了疯子，母亲又被匪軍迫害而死。一家人被万恶的旧社会欺压、逼迫得七零八散。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小玉琴在死亡綫上掙扎着。她討过飯，当过童养媳，做过童工，当过佣人……。童年，帶給她的只有悲痛和仇恨。

解放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把她从苦难中解救了出来。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她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每当我看到那些背着小书包愉快地走向学校或者在公园里玩得兴高采烈的孩子们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自语道：“多么幸福的童年啊！”这一切，在今天的社会里都不足为奇了，可是在旧社会里穷人家的孩子怎么敢想呢？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时代……

(一)

我的家原来住在山东省掖县刘村。家里有爷爷、奶奶、大伯、大娘、父亲、母亲、我、妹妹（大伯的女儿）共計八口人。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家里很穷，天天吃糠嚙菜，有时連这些也吃不上。爷爷給地主家累死累活地干了一輩子活，連一条不上补丁的褲子都沒掙下。奶奶受了一輩子苦，身子骨不硬实，得了个心疼病，只能干挺着。有一天，她把我大伯和父亲叫到跟前說：“你爹苦苦干了一輩子活，咱全家也跟着挨了大半輩子餓，你們得要点强……”沒等說完就死了。

我大伯和父亲，記住了老人临死时說的話，每天起早貪黑，拼命地干活，可是仍然是糠菜充飢，有时也还揭不开鍋，日子到了沒法熬的地步了。爷爷沒有办法，不得不含着眼泪，打发父亲出去“闖关东”。

父亲走后，家里的生活更苦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娘又生了小孩。有錢人家生儿女是大喜事；穷苦人家生一个小孩，却是个累贅和負担。为了还地主的債，大娘不得不忍痛把自己刚滿两个月的婴儿的奶水掐断，去給地主家当奶娘。

地主的欲望是个无底洞，大娘的奶水当然无法把它填滿。債，不仅沒有还上，反倒越滾越多了。地主的狗腿子天天登門討債，鬧得我們家坐臥不安。一天，他們闖进屋，不容分說，就把大娘拉走了，說是讓她給地主家当长期佣人，抵償欠債，实际上，是地主老財起了歹心，想霸占我大娘。从此以后，大娘就掉进了老虎口。大伯又急又气，天天偷偷地到地主家門前轉悠，想要把大娘搭救出来。可是，他每次都是被狗腿子打得鼻青脸肿地跑回家来。

一天，已經深夜了，大伯还没有回来，全家人十分着急，四处寻找，找到地主家門口时，发现大伯倒在地上。原来他来看大娘时，被狠心的地主狗腿子把

右腿給打断了！鮮血流了滿地。从此，大伯变成了残废。好好的夫妻被地主活活拆散，再加上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大伯被逼成了疯子。

这时，大娘生的孩子还只有几个月，由于断了奶水，每天吃些地瓜叶度命，瘦得皮包骨，不久也餓死了。

大伯被逼疯，孩子餓死的消息传到大娘的耳里，大娘苦上加苦，再无心活下去了，就在一个黑夜里，偷偷地上了吊。

爷爷由于长期受累，得了瘫痪症，再加上眼前的遭遇，連气带恨，从此倒在炕上再也起不来了。

我們家里，除了疯大伯、病爷爷，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了。生活怎么办？真是走投无路！最后，母亲只好領着我出去討飯。

討飯更难。那时，日本鬼子、国民党、土匪到处橫行、搶男霸女，女人們为了自身安全，尽量少外出。但年輕的母亲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只得硬着头皮出去討飯。

我和母亲每天东討西要，也討不到多少；因为大多数人家，都和我們一样穷，他們同情我們，却无力周济；有錢人又哪顧穷人的苦，不仅吝嗇得一毛不拔，还时常辱罵欺侮我們。有一天，我跟母亲走到一家地主的大門口，苦苦哀告了老半天，一个胖胖的地主婆

走了出来，对我们开口就骂：“你们这些臭要饭的，有东西宁可给狗吃也不能给你们！给狗吃还能看看家呢，给你们吃有什么用！”母亲忍着这恶毒的辱骂，指着我说：“可怜可怜孩子吧，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谁知她冷笑一声，唤出了她家的看门狗，狗仗人



势，恶狠狠地向我和母亲猛扑过来，母亲一面护着我，一面领着我就跑。但两条腿哪有四条腿跑得快，母亲的裤子已经被大狗撕破，腿肚子上被咬了几口，鲜血顺着大腿直往下流……

逃脱了大狗的追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本来就空着的肚子，这时“咕咕”地叫得更难受。我越走越饿，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说：“娘！我饿，我要吃……”娘为难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快起来，咱们要去……”但是，上哪去要呢？已经要了大半天了，筐里还是空空的！母亲好像也想到了这点，

她呆呆地站在我身旁，泪水从她眼里流出来，滴到我的脸上。我那时虽只有八岁，可是已经懂事了，我见母亲哭了，就赶紧说：“娘，咱们走吧，我不饿了。”

快到太阳落山时，我们娘俩好不容易在一家碾房要到了一瓢麸子糠，我高兴极了，心想这回可以吃点东西了。

到了家，妈赶快点火，烧了一锅开水，准备做点糊糊，全家人喝一顿充充饥。谁料还没等往锅里下麸子面，就闯进两个匪兵，硬逼着向我们家要粮。说我们家烟囱冒烟就是有粮的证据！

他们在我家翻了半天，也没见到一粒米，最后，竟对我妈起了歹心，想糟踏她。我妈挣扎、反抗，咬伤了匪兵的手。匪兵歹心没得逞，老羞成怒，操起水瓢，从锅里舀起一瓢开水，就向我妈脸上、身上泼去。我妈被烫得在地上乱滚，不一会儿，浑身上下都起了鼓溜溜的大水泡。一连几天一点东西也吃不下，病势很重，又没有钱医治，只好眼看着妈被伤痛折磨。

妈病了，家里能活动的人，就剩我一个了。我知道母亲已经好几天没吃一点东西，就一个人跑到外边，想给她要点东西吃，幸好一家穷苦邻居给了我两个地瓜叶掺豆面做的馍馍。我拿着馍馍高高兴兴地跑回家，

見母親正躺在炕上睡覺呢。我輕輕地上了炕，趴在母親身旁，低聲喊娘，可是，怎麼叫她也不醒。這時，爺爺才告訴我：“你娘死了！”

“娘真的死了？”我不相信，我拼命地推母親的頭，搖她的胳膊，想把她叫醒，但母親却再不張口了。

我們窮得連飯都吃不上，哪有錢買棺材，沒辦法，只好用全家僅有的一床破被和炕席裹着娘的屍體，草草地埋了。

娘死后，爺爺為了讓我活條命，就把我給了一家姓劉的。不久，劉家因生活困難，又把我轉賣給了一家姓李的當童養媳。不久，李家兒子得病死了，又把我轉賣給一家姓孫的當童養媳。

老孫家是地主，家里很有錢；但是越有錢就越不拿窮人當人看待。那時，我名義上是他家的童養媳，實際上是她家的奴隸。一天到晚，什麼活都得干：做飯、打水、砍柴、割草。干活時，還得背着他家的小兒子（我的“丈夫”）。

有一回，孫家的老地主婆叫我去刷鍋。我想把孩子先放到地上，等刷完鍋再背他，可是還沒等放下地，那孩子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地主婆操起燒火棍照我頭

上就是一下子，把我的脑袋打了个大包；我沒敢哭，也沒敢用手去摸，赶忙又从地上背起了小孩去刷鍋；不料小孩不老实，一不小心就从我背后掉到了鍋里。这下子可惹了大祸，地主婆硬說我有意摔她孩子，不分青紅皂白地操起鍋鏟子劈头盖脸地向我砍来，砍得我脑袋直流血。这场毒打，打得我遍体鳞伤，但还不許我哭；只有到了夜里，我才敢在自己睡觉的草堆上偷偷地哭。

姥姥（外祖母）听说我在孙家受虐待，有一天来看我，见我满脸满身都是伤痕，就心疼地哭了；我见了姥姥，一头扎进她的怀里，哭着求她把我救出这个火坑。正在这时，孙家的地主婆来了，她对姥姥說：

“这个小瘦猫，可是我們用二斗高粱换来的，你要可怜她，也不难，拿二斗高粱米来領她滾！”姥姥家也是穷人，哪有粮食来贖我呢？沒法只好哭着走了。我望着姥姥的背影，呆呆地站着，心里难过、絕望，真想一下子死去。

过了一年，老孙家的孩子又得霍乱死了，地主蛮不講理，硬賴她儿子是我給“尅”死的。她对我說：

“我儿子死了，你也別想活着！”当天把我和她儿子的棺材一块儿鎖到碾房里，想把我活活餓死。

我在碾房里呆了一天零半夜，餓急了，就把地主婆給她兒子上供的飯偷吃了。吃完后，我知道自己又惹了大禍，第二天免不了還要挨一頓毒打，這還不說，再這樣呆幾天，還不得活活餓死？於是，我想到了逃跑。但是，門反鎖着，窗戶又高，上不去。最后我用燒紙的盆墊着，爬上了窗台，跳出了碾房，逃出了孫家這座活地獄，一口氣跑到了姥娘家。

過了幾天，孫家來要人，讓我回去，我死也不肯。孫家說：人不回去也可以，但得拿出錢來，賠償損失。好心的大舅母不忍心讓我再回到孫家去受罪，就把她唯一的財產——出嫁時用的手鐲、棉袄都給了孫家，這才算是把我救出了火坑。從此我就隨老娘家的姓，改姓任。

姥娘家的生活跟我們家一樣：二舅、三舅早都“闖關東”去了。大舅這時窮得實在沒法，最后也決定把家裡的破爛東西賣掉，領着全家去“闖關東”。

(二)

我和外祖父、外祖母、大舅、大舅母一家人，踏上了逃荒的路途。變賣家產所得的幾個錢，幾天就花光了，我們只好一邊討飯，一邊趕路。在路上經過了

六個多月的時光，最後才走到當時的“新京”（長春）。

白天，到垃圾箱里揀點什麼東西糊口。晚上我們睡馬路，蹲牆根兒。就是這樣，日本人和警察還要踢我們，趕我們走。

在“新京”呆不下去，我們又到了宋家洼子。這時外祖父病死了。當地的窮人可憐我們這一家人，給大舅找了點木匠活兒干，算是有了個職業，但生活仍然苦得很。吃的是糠皮、野菜、橡子面、豆餅。住的是冬不擋風，夏不避雨的一間茅草棚子。這年，大舅母又生了一個小女孩，小孩沒奶水，大舅母被逼無奈，不得不忍心把自己的親生骨肉扔在洗衣盆里淹死！當時的情景，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盆里的水冒着氣泡，小孩的一雙小手直“扎撒”，舅母背過臉去，流着眼淚，我也吓得直哭。唉！在那個年月里，有多少窮苦人家的孩子，在他們剛剛降生人世的時候，就被吃人的舊社會奪去了生命啊！

為了生活，我不得不跟着大舅母到附近的工棚里去做些零活，給單身的工人們縫衣、補襪。可是，工人們的生活也很苦，他們自己還顧不上自己呢，又哪有錢給我們。他們出于階級同情心，有時從自己的口中省下點吃的東西給我們。

記得有一回，我和大舅母刚从工棚出来，正好遇上了工头。他狠狠地打了我們一頓，又像一只餓狗似地跟在我們后边，到了一块高粱地拦住了大舅母。我吓得赶紧跑回工棚去喊工人，可是等我們赶回来时，大舅母已被奸污了。她受到这个打击和污辱，不想再活下去了，工人们百般劝说，又亲自把她送回了家。以后大舅母就再也不到工棚子里去做工了。

大舅母不做工了，家里又少了一个挣钱的人。为了活下去，我当时虽只有十一岁，也只好到一家油纸厂去请求做工。可是人家嫌我太小不肯要我。后来经人讲情，才把我当个“半价工”勉强收下。

名义上是“半价工”，实际上是干大人的活。我岁数小，身体弱，干起活来吃力，每天不知要挨多少打骂。虽然这样，自己还得硬挺着干，因为经常有人失业，我更是提心吊胆，生怕被裁下来。

可是，越是怕失业，失业就越找上头来。果然，有一天，在我上工时，工头给了我一毛钱，说：“你以后别再来了！”当时我心里难过的滋味就不用提了。

接着，我又到一家糖厂去当童工。为了怕失业，每天总是早来晚走，拼命地干，累得腰痠腿疼。但是

不久糖厂倒閉，我又一次失业了。

失业后，我心里很着急，千方百计地找干活的地方。后来听说“关东軍”仓库里雇人，我就想去。邻居王大娘提醒我说：“那个地方可是个‘老虎口’呀，你可得好好想想。”我还能想什么呢，生活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我把心一横，说：“我什么也不怕，别人能去，我就能去，只要它雇我就行。”

我上“关东軍”仓库去卖工，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初春，那时我才十二岁。

“关东軍”仓库，是一个大院，院墙用红砖砌成，上面布满了铁丝网，真像是一座人间地狱。

院墙外挤满了卖工的人，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大部分是十六七岁的大姐，还有少数的大娘、姨子和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姑娘。

天气寒冷，北风刺骨，我们穿的衣服又破烂又单薄，挡不住寒风的侵袭，大家只好依偎在一起，靠互相的体温取暖。我的手脚冻僵了，耳朵冻得更像猫咬的一样火辣辣地难受。等了好半天，雇工的哨子才响起来。

女工们听到哨子响，都跑着去站队，我也跟在后面跑去了。雇工的人逐对儿挑选，认为合格的，就发

一个木牌。我头一次来，没人跟我搭伴儿，再说，我又比别人矮一头，所以没有被雇上。

第二天，我又抱着很大的希望前去应雇。工头不但不雇用我，而且还辱骂我说：“你这个不会下蛋的瘦小鸡，还想到这儿来找食吃？”我一连去了五、六天，天天失望而归。

有一天，已经雇完工了，看着被雇上的人往里进，我难过得蹲在墙根角流眼泪。突然一个亲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小妹妹，你哭啥？”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我向她说明了一切，她很同情地安慰我说：“小妹妹，别难过，今天不行，明天你再来，我帮你想点办法。”这位大姐就是现在我常常提起的紅秋姐姐。

第二天，我早早地到了仓库，不一会儿，紅秋姐也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小板凳，领着我来到每天雇工站排的地方。她四处打量了一下，就迅速地把小板凳放在墙根角上。正在这时，雇工的哨子也响了。大姐推了我一把，指着小板凳说：“快！快站上去！”我还没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站了上去。大姐随即掩护似地站在我的前面。我的心怦怦直跳，神态慌张，大姐似乎感觉到了，就用手扯我的衣襟，暗示我不要怕。

过了一会儿，雇工的走到大姐跟前，打量了我们一下，给了她两个小木牌儿。我就这样在红秋姐的帮助下，进了“关东军”的仓库。

在“关东军”仓库干活，每天都要闖三道大关：第一道是雇工关；第二道是鬼子、工头欺压污辱关；第三道是放工时经过的总门口关。

我已经闖过了第一关，接着就闖第二道关。我们主要是给关东军选军衣、毛衣、毛袜、军用地毯等物，有时也干些笨重的杂活。干活累，自不用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鬼子、工头的欺压。当时看管我们的一个是日本“钥匙官”，他管仓库，身上挎了一大串钥匙，身穿军衣，挎洋刀，两只阴森森的眼睛活像个吃人的魔王。另外一个叫“李小鬼”。他整天跟在日本鬼子屁股后面，对日本鬼子点头哈腰，溜须拍马，所以得了这个外号。又因为他长了满嘴大黄牙，左腿有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好像一个被打伤的狗，人们管他叫：“瘸腿狗”，“够缺德”等外号。

他俩狼狽为奸，对我们女工又凶暴又残忍。我刚入厂不久，不懂这里的规矩（日本鬼子订了很多规矩限制我们工人。其中有：干活不准谈话，挨打不准停工等），跟红秋姐一起坐在地上选军衣，我本来年纪小，

又因为开始手生，干活慢了些。这时，“李小鬼”来了，不容分说，照我的腰上就是一脚！我没按他们的“规矩”，当时疼得就倒在地上哭起来。这样一来，“李小鬼”踢得更凶了，多亏红秋姐姐和其他姐姐们讲情，才饶了我。我们唯一许可的是喝口凉水，但连这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很多姐妹，就是由于去喝水被鬼子和汉奸给拉去强奸了。

我们为了安全，就成群结伙地去喝水，这样一来，鬼子和汉奸的野心不能得逞了。但他们又换另外的办法污辱我们：在我们喝水时，用胶皮水管往我们身上浇凉水。冬天，水浇在身上，又冷又疼，好像小刀刺进骨头里。当我们走回工房时，全身冻成了“冰人”，鬼子和汉奸看到这种情形却哈哈大笑。

这还不算。他们连饭盒都不给我们热一热。十冬腊月，我们还得吃冷饭，越吃越冷，有时吃得肚子疼。有一次，正好轮到我给监工的“李小鬼”烧炉子。我看到炉子里红通通的炭火，心想：何不把姐妹们的饭盒拿到这里来热一热呢，于是，我出去拿了几个饭盒，一边烧炉子，一边热着饭盒。正在这时，“李小鬼”进来了，发现了饭盒，就像疯狗一样扑到炉子前，把饭盒全给摔到地上了。他一边摔着，还一边骂着：“他妈

的！瘦狗还想吃热飯！”我看到姐妹們活命的飯被他給白白糟踐了，又听到他出口罵人，就頂了他一句，他一听，更凶了，不知拿什么东西照我脑袋上就是一下子，当时把我打得头晕眼花，鼻口流血。这时紅秋姐来了，她拦住了“李小鬼”，为我辯护了几句，“李小鬼”更火了，又把紅秋姐打了一頓，并逼着紅秋姐拿爐鈎子鈎着我的嘴在院里游行示众。紅秋姐当然不肯，“李小鬼”馬上拿起爐鈎子又要打，我怕紅秋姐再为我挨打，又怕把事情鬧大連累紅秋姐姐，就拿起爐鈎子放进嘴里，向紅秋姐姐示眼神，意思叫她快拉我走。可是紅秋姐一动不动地站着，并对“李小鬼”說：“这不是中国人对中国人干的事。”“李小鬼”看紅秋姐不动，就凶狠地夺过爐鈎子把我拉出屋外，紅秋姐拼命阻拦，可是不頂用。

十冬腊月，滴水成冰，鉄鈎子在嘴里一动就掉一层皮，鮮血順着嘴角直往外流。姐妹們都哭了，可是汉奸“李小鬼”却发出狼嚎般的狂笑。紅秋姐实在忍不住了，气憤地站出来和“李小鬼”展开了斗争，女工們也紛紛起来抗議，喊道：“住手！不准祸害人！”在众姐妹們輿論的压力下，“李小鬼”怕鬧出事来，像条丧家狗似的赶忙夾着尾巴溜走了。由于姐妹們的帮助，

才算倖免了這場殘害。

除了上兩道關，還有第三關，這道關更霸道，人們叫做“鬼門關”。每天放工，女工們都得經過一個總門口出去，在這裡，女工們要挨個兒受檢查。誰被懷疑“有問題”，就得被送到“單間”里去進行“特別審查”。可是，進了“單間”的人，十有八九是回不來的。所以，每天放工經過這“鬼門關”時，人人提心吊膽。要是有誰對這種檢查稍稍露出一點不滿的情緒，馬上就會被加上“思想犯”“反滿抗日”等罪名，加上了這一罪名，就更別想活了。



尽管他們对待我們女工的花招再多，手段再毒辣，也压服不了我們的反抗和斗争。有时，我們在洗衣服时，偷偷地把軍衣烧坏、撕碎，有时在衣服上画上大狗头，有时还往軍鞋和袜子里放大头釘等。

另外我們还利用停工和“磨洋工”等办法来反抗鬼子。工头“李小鬼”来了，我們就紧干；走了，我們就把軍衣、毯子往地上一鋪，躺下休息。为了安全，我們还有打眼（放哨）的，如果发现工头来时，就用暗語告訴我們，我們就赶紧起来干活。

一天，日本鬼子和“李小鬼”，气势凶凶地闖到我們工房。“李小鬼”大声道：“听着，現在太君訓話。”說完他像条狗似地站在日本鬼子一旁。

日本鬼子走到我們跟前，恶狠狠地說：“火，誰的放了，嗯？”“李小鬼”又补充一句說：“是誰把軍衣給烧坏了？”我們只是低头干活，誰也沒有答言。

日本鬼子看我們不吱声，气得暴跳如雷，更凶狠地嚎叫道：“快快地说！是誰的干的！”他逐个地打量。大家还是不吱声。沉默了好久，“李小鬼”看大家不說，就用鞭子狠狠地向我們抽来。

我們憤怒地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地說：“我們不知道！”接着誰也沒有坐下干活。

这时，那个日本鬼子的手脚就像被火烧着了似的，双手搓掌在地上来回走。“李小鬼”眼看压不倒我们，悄悄地在日本鬼子耳边嘀咕了几句，日本鬼子恶笑了一下，点点头。于是“李小鬼”叫道：“杨桂兰、李小珍、任诺（我解放前的姓名）出来。”在姐妹中我们三个是最小的，日本鬼子想吓唬我们，逼我们说出真情来。开始我心里有些害怕，但想起了红秋姐姐常告诉我们：只要不说，气死他们也找不到个人影。又看到姐妹们团结一致，特别是红秋姐姐那种沉着、镇定的眼神，想起她平日对我们的爱护，我什么也不怕了，打定了主意：打死我，也不能说。

我们三个跟着日本鬼子来到工头休息室。他让我们坐，又叫人拿出一堆方糖让我们吃，并说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只要把事情说出来，就放我们回去。可是我们不吃也不说。过了好一阵子，日本鬼子见我们不吱声，这时露出了凶狠的真面目：先打了杨桂兰，后又打我和李小珍，把我们折磨了足有两个多小时，我们三个大声哭大声喊：“不知道，打死也不知道。”正在这时，“李小鬼”慌张地跑来向日本鬼子说了些什么，日本鬼子才把我们放了。当我们回到工房时，看到姐妹们还站在原地没干活。原来是姐妹们进行了停工斗

爭，要求把我們放出來，否則就不干活。鬼子和漢奸一來怕事情鬧大，二來也沒有逼出什麼名堂來，只好放了我們。這次鬥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並沒有根本改變我們受欺辱、受壓迫的地位。

在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們當時正在抬大木頭，快下班的時候，我又累又餓，渾身沒勁，走不幾步就跌倒了，沉重的大木頭砸在我的手指上，砸掉了指甲，鮮血直流。姐妹們都圍上來，把我扶起，給我包紮。正在這時“李小鬼”過來了，一頓鞭子把姐妹們抽散。紅秋姐姐和王大娘看我受了傷，便偷偷地把我扛的大木頭給幫着抬走了。“李小鬼”見我沒干活，拿起鞭子就向我抽來，我疼得在地上直打滾。這時，紅秋姐火了，再一次跑來維護我：她攔住了“李小鬼”，向他講道理，還要求給我的手藥。“李小鬼”更火了，他拿起鞭子就打紅秋姐。姐妹們也都圍了上來打抱不平。這時，“鑰匙官”也來了。他怕把事情弄大，影響干活，就假意地喝住了“李小鬼”，並對紅秋姐姐說：“紅姑娘，你的說話頂好，我的同意上藥”。他一面叫大伙繼續去干活，一面讓紅秋姐領我跟着他走。紅秋姐見我受傷，又見我有些怕日本鬼子，便扶着我跟在“鑰匙官”和“李小鬼”的後面。

我們左拐右拐，走了好長時間，來到了一個大房子跟前。日本“鑰匙官”打開了門上的鎖，我和紅秋姐就進去了。

屋子里全是大箱子，麻袋包，我邊走邊看，等着上藥。這時，突然聽見紅秋姐姐喊：“快往外跑！我們上當了！”我連忙轉過身來，出路已經被“鑰匙官”和“李小鬼”這兩個野獸擋住了。他們滿臉奸笑，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像要吃人的惡狼一樣，向紅秋姐撲去。紅秋姐大喊：“救命呀！救命呀！”我也跟着喊。“李小鬼”伸手抓住我的小辮子，就往外拉我，我沒命地往紅秋姐跟前奔，想拉她一起逃出虎口。我們四個人打成了一團。忽然，紅秋姐又喊：“刺刀！刺刀！”我還沒來得及躲閃，背後就挨了一刺刀。一陣劇烈疼痛，使我失去了反抗的力量，我被推出了門外。

我忍痛從地上爬起來，使勁兒地推門，推不動；我就使勁兒地敲門；一邊敲，一邊喊紅秋姐姐。開始，我還能聽到紅秋姐喊叫和反抗的聲音，漸漸地，就只聽到她微弱的掙扎聲了。

我在門外急得心都要碎了，但是無法救出紅秋姐來。我又連忙跑到工地上去找女工姐妹們，可是，當我跑到工地時，才發現已經放工了。我只好一個人

又返身跑回大房子前，这时，天已經黑了。

我好容易摸到大門，扯开嗓子喊我的紅秋姐姐。但，回答我的却是我自己的回声。我还不死心，又用力地去敲門，敲啊，敲啊，突然我的手砸到了大鐵鎖上，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門早就上鎖了。我失望地站在門前，过了好久，我才无力地从鐵絲网下面鑽了出去，慢慢往家走。

第二天一早，我又到“关东軍”倉庫前去找紅秋姐姐。在雇工时，我看見了“李小鬼”就追問紅秋姐姐的下落，他不耐煩地說：“她是‘思想犯’，你問她干什么！”我还繼續追問，他又說：“她給太君当‘噉庫桑’去了！”（当“太太”的意思。）我想到昨天晚間的景象，覺得可疑。当我还要往下追問时，他却使勁地吹起了雇工的哨子。

女工們听到哨声，都集合在一起，等待雇用；我也夾在人群中去站队。但是，天天与我做伴的紅秋姐姐，今天却不見了，我的心难过极了。这时，一个老大娘将我拉在她的背后，并用脚偷偷地踢給我一块砖头，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这种情景，馬上使我联想到了紅秋姐第一次帮我入“关东軍”倉庫的情形，想起了她遞給我的小板凳，想起了她平时对我的保护，想

起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不禁流下了热泪。

雇工的牌子放完了，我没有被雇上，而且，由于我还连累了这位好心的老大娘。我着急地跟在“李小鬼”的身后问他：“为什么不雇我？我要进去找我的红秋姐姐去。”他听了这话，眨了眨眼睛，恶声恶气地说：

“好吧，跟我走！”我找红秋姐姐的心切，没有发现他的恶意，就跟着他向门口走去。快到门口时，那位好心的老大娘忽然在后边喊我：“傻孩子，你跟他进去，还能出来吗！”这时我猛然惊醒过来，扭头跑开了。

从此以后，我没有再到仓库去干活，但我却天天想念红秋姐姐；我多么希望能看到她啊！但是，这只能是梦里的事情了。

像红秋姐姐这样的姐妹们，在“关东军”仓库这座人间地狱中，不知被害死了多少！这笔血债是永远也算不清、算不完的！

在“关东军”仓库当童工失业后，背上的刀伤一直折磨了我好久。但因生活所迫，不等痊愈我又到一家小药铺去当杂工。有一次因捣药没捣好，被主人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一赌气摔了他的药缸子，自然，也就丢了我的饭碗。

(三)

一九四四年八月，經別人介紹我来到一个开书店的日本人家当佣人。那时我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我什么活都得干，甚至連他家的那条白狗一时侍候不到也要挨罵，一天到晚，沒有一时空閑。

我常常因为不懂日本話，做不好他們的飯菜而挨打受罵。这还不算，更使人生气的是：男主人常常上妓院，女主人逼着我去找。我若不去，女主人打罵我；我若去找，找到了，男主人也打罵我，真是两头受气。

过了一些日子，我学会一些日本話，也会做很多日本人喜欢吃的东西了。但是，在这些香噴噴的飯菜里，含着多少痛苦、辛酸的血汗泪水啊！我每天操劳，真不如他家养的那只狗。那只狗連大米飯鍋粑都不吃，养得肥头大耳的，可我却一天天地瘦下去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一天，姥娘托邻居姓孙的更夫給我捎来个口信，說她身体不太好，要我回去看看她。当时正是春节之前，我急得几宿沒睡觉，总寻思：带点什么东西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呢？最后，我想起了那

堆大米飯鍋粑，就苦苦哀求女主人把它送給我点，她答应給我一小盆，但得扣掉我三个月的工資。尽管这样，我还是流下了高兴的眼泪，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为了让姥姥高兴，我又买了两张年画，一张是“四季平安”；一张是“年年有余”。我觉得，这两张画，是穷人日夜盼望实现的心愿。姥姥一定也会喜欢的。

旧历腊月廿三，正是过小年的日子。我带上飯粑和年画回到了家。全家人见了飯粑，都高兴的不得了。因为在那个年头，一般老百姓吃大米白面都是“经济犯”；再说，像我们这样終年见不到米粒的人家，头一次见了大米飯鍋粑，真像是见到了什么宝贝一样。我表妹小二丫，瞪着两个小圆眼睛，紧紧地盯着飯粑不动，姥姥爱惜地拿了一小块给她，同时又吩咐大舅母说：“全做上吧，熬鍋粥咱全家人都尝尝，也算是过一回年。”

小二丫拿着飯粑一边吃一边跑到外面玩去了，我也忙着把年画贴在墙上。我们大家看着这两张年画，大舅母说：“我们的日子要真的能像画上说的那样就好了。”

在我们刚要吃饭时，突然传来一阵“电驴子”的

响声，接着，又听到了小二丫的哭声。我們以为一定是小二丫讓車給压了。我和舅母慌慌张张地往外跑，还没等我們跑出大門口，就看見恶狠狠的保长揪着小二丫的耳朵，連踢帶打地朝我們屋里走来。后面还跟着两个警察。

保长进了屋，見了大舅，上去就是一頓左右开弓的大耳光子，大舅被打得鼻口流血，还不知是犯了什么罪。这时，保长才說：“偷吃大米，經濟犯！”說完，領着两个警察在屋里乱翻起来，把我們刚刚做好的大米飯鍋粑粥，全倒在地上。最后什么都沒翻着，就把舅舅綁了起来，拉着往外走。我們全家哭成一团，舅母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拉着舅舅不放。狠心的保长、警察，在毒打了怀着七个月身孕的舅母之后，也把她綁走了。

这真是祸从天降！事后，我們才知道，原来小二丫拿着大米飯鍋粑在外面吃，被崔保长看見了，他馬上报告了警察，把我們当成了“經濟犯”！想不到我用血汗换来的一点鍋粑竟惹了这么大的祸！我們穷人命运，是多么悲惨哪！

但是，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舅舅、舅母被綁走之后，我和姥娘天天到保长家里

去打聽他們的下落，總也得不着個准信兒。一天，保長到我們家說：“拿一百元錢到派出所去取人”。天哪！我們家連橡子面都吃不上，到哪儿去弄這麼多錢呢？但，救人要緊，我們把全家所有的東西完全賣光了，才賣了十來元錢，最後沒辦法，只好決定賣人了。

姥娘左思右想，決定把小二丫賣掉。二丫當時剛剛懂事，聽說要讓她離開家，跟一個生人走，她就說什麼也不干。她一邊哭一邊指着我說：“爲啥不賣姐姐呢？”我看到這種情景，不禁想起自己被賣後所過的辛酸生活，心裡難過得像刀子割一樣，忍痛對姥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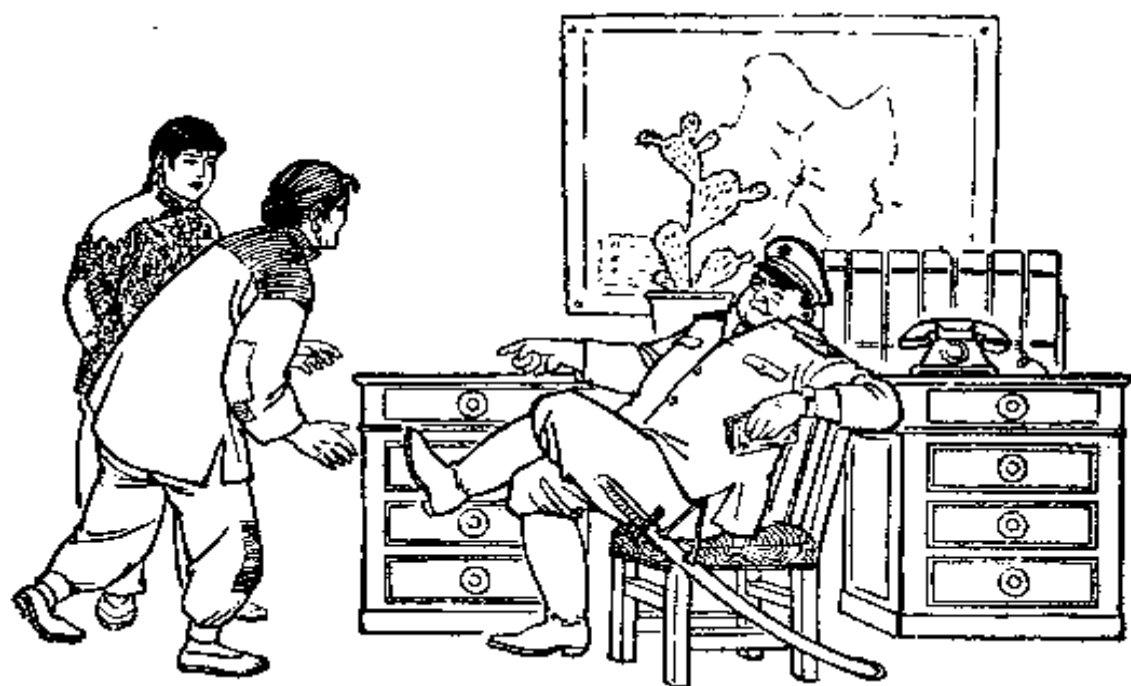
“還是把我賣掉吧！二丫小，不懂事……”但姥娘對我說：“你多少還能掙幾個錢幫幫家裡，還是賣小二丫吧，等救出了你大舅和大舅母，再把她買回來。”二丫聽說要救她娘回來，不禁又高興地喊了起來：“娘，娘……”我和姥娘哭得不成樣子，最後還是賣掉了小二丫。

連東西帶人！總共賣了不到二十元錢。我們拿着錢到了宋家洼子白狗大街警察所。一個肥頭大耳的胖警察坐在椅子上，一邊點錢一邊說：“這幾個錢，能夠買三個狗頭嗎！”原來，舅母懷着的嬰兒，也得頂個人數拿錢來買。警察們的敲詐勒索，真是無所不至，

就連这个沒有出世的嬰兒，也不能倖免！

我与姥娘苦苦哀求，开始胖警察不理不睬，最后才給了我們一张紙条，說：“人不在此地，到新京市立医院去取。”

跑到市医院（在現在吉林医大二院地址），走进一个黑洞洞的像冰窖一样的大房子，我立时感到渾身寒冷，直起鷄皮疙瘩，一股血腥味儿扑面而来。在我們眼前，一具被剖腹的女尸倒在血泊里，未滿产期的小嬰兒，血肉模糊，胡乱地堆在女尸身旁。真想不到我們傾家蕩产，忍痛卖掉亲生骨肉的几个錢，换来的却是一首不完整的尸首。悲痛、仇恨，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我也記不得当时我和姥娘是怎样收斂了舅母的尸体的。第二天，我們不甘心，又到警察所去要舅舅。誰知道，他們早就把大舅罰了劳工。我們唯一的一点希望全破灭了。

听人說，医院經常用錢勾通警察把抓来的人作解剖試驗，大舅母就是这样被害死的。我們异常气愤，認為：有理可走遍天下。因此，當場就告他們勾結医院残害百姓的罪状。誰知，状不仅沒告成，警察官反而打了姥娘耳光，并大声罵道：“大胆！穷要飯的，竟敢告到警察的头上来了……再囉嗦，連你这老东西也别想活！快滾！”姥娘气得直打哆嗦，咬牙切齿地說：

“你們还講理不？你們这些狗娘养的，你們……”姥娘过于悲痛和气愤，再也說不出話来了。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对我說：“苦孩子！誰叫咱是穷人来着，这不是給穷人說理的地方。”她无力地扶着我走出了警察所。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錢人家张灯結彩，鞭炮齐鳴，欢欢喜喜过春节；可是我們却骨肉离散，家破人亡。回到家里，我和姥娘呆呆地望着墙上那两张“年年有余”“四季平安”的年画，流着眼泪，餓着肚子，就这样熬过了凄惨的年夜。

第二天，姥娘投奔三舅去了，我也回到日本人家

里，想繼續当佣人。可是，日本人因为我耽誤了几天工，不要我了！怎么办呢？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流浪，心想到哪儿去找个落脚的地方？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一所孤儿院。听人說，孤儿院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孤儿，因此我想进孤儿院。当我刚走到大門口时，就听到从院里传出来一个小女孩的惨叫聲，紧接着，見一个小女孩跑出来，一直跑到馬路下坡的河边跳了河。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惨象吓住了，也再不敢进孤儿院了。我心里又愤恨又难过，我恨旧社会的黑暗，我难过为什么像我們这样无辜的孩子就遭到这样的不幸？我在馬路上徘徊好久，沒有办法，又只好回到日本人家，苦苦哀告：宁可不要錢，給他們白干活。他們見这挺合算，就答应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一天夜里，我从男女主人的談話中偷听到局势对他們很不利，他們想回国，并且也想把我带回日本的东京，卖到妓院去。我听了心里又气又恨，决定找机会逃跑。过了几天，男主人果真买了車票，准备回国。到了火車站，我趁着人多拥挤的机会，蹓出車站，一口气跑到了三舅家。

过了一个多月，日本鬼子投降了！我跟着欢乐的人群庆祝抗战胜利。我恨透了日本鬼子，見了日本鬼

子就打，我还砸碎了警察所的玻璃。心里想：这回可盼出头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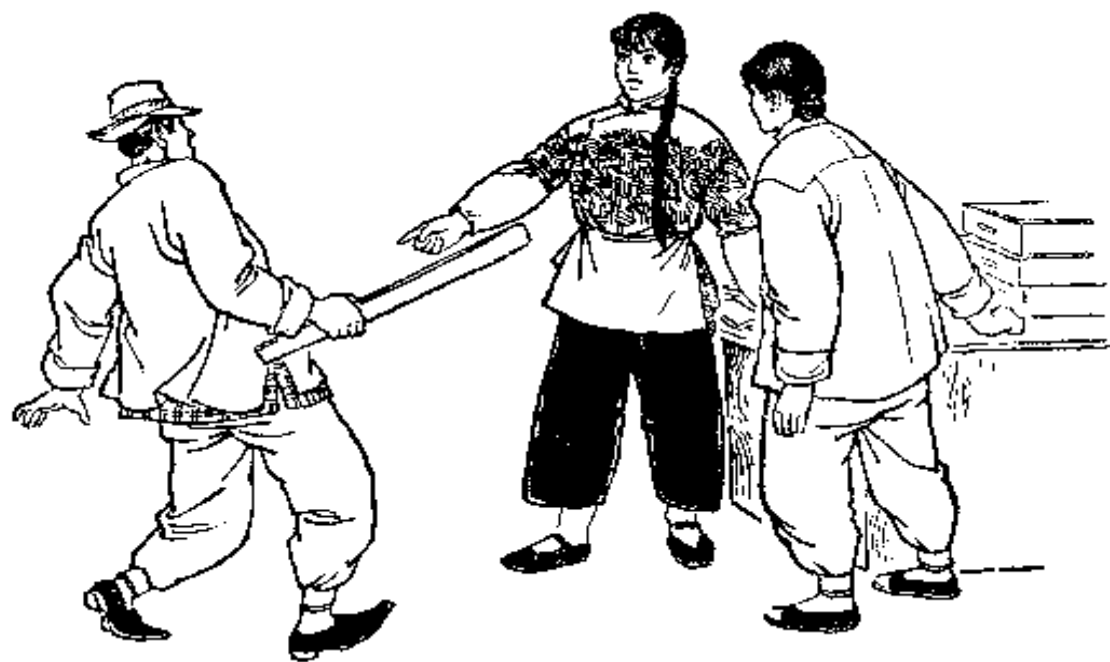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我高高兴兴地来到了一家中国资本家开办的“永昌烟卷公司”做工。当时我满心想，给中国老板干活，总比给日本鬼子干活强些。但是，我失望了。因为我们每天头不抬、眼不眨地干活，累得照旧是喘不过气来，而每月挣到的工薪却只够买三双袜子。这还不说，在干活时，仍然常常挨工头的打骂。

这个公司对工人也有很多限制。如：干活时不准说话；每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上厕所；下班时要受翻兜检查等等。谁违反了，不是挨打，就是挨罚。跟日本鬼子那一套完全一样。

这年，我才十五岁，除了受这些限制打骂之外，还常常受到工头的污辱。公司里有个姓岳的工头，仗着是这个公司经理的亲信，经常欺压我们。有一次，他调戏我，被我拒绝，他就借机找我的“小脚”，硬说我卷的烟不合格，结果白白干了一天。又有一次在下班翻兜检查时，非让我把钮扣解开进行检查。我说什么也不肯，他便怀恨在心，总想找我的岔儿。

有个叫王刘氏的老大娘，有一天，从地上拣了个工头扔下的烟头，刚抽了几口，就被岳工头发现了，他硬说这个大娘天天偷抽公司的烟，非要处分不可。他抓来一把烟丝放在桌上，逼着这位大娘生吃下去，并说：“吃不了就别怕挨打！”我看这位大娘被逼无奈的样子，非常同情她，也非常恨工头的狠毒。我走到桌子前，拦住了想要吃烟丝的王大娘的手说：“别吃，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吃烟丝的道理！”工头把烟狠狠地往地上一扔，恶狠狠地说：“她吸了公司的烟，就该罚！快！快吃！”“吸了公司的烟？你整天吸，你更应该罚呢！”我说。他张口结舌地说不出个啥来，只是说我违犯“厂规”，因而要开除我。当时，我心想，有理怕啥，我说：

“凭什么开除？就是开除了，到哪都凭力气干活！”他像发了疯似地指手划脚地大骂：“滚！快滚！”王大娘和女工们为我担心，怕真的开除，有的为我讲情，李玉琴和几个姐妹劝我别孩子气了，说：“你上哪干活，都得听人家的喝！”我知道这是实情，这个世道就像一条铁链子紧紧地勒住了我们的脖子，连气都喘不过来！为了保住眼下盛满苦水的饭碗，只好忍着！忍着！经过姐妹们再三讲情，才使大娘免遭了一场毒打，我也没被开除。但从此，这个姓岳的就更恨我了。在这事



发生以后不久，有一天我因为泻肚子，上厕所去的次数比平日多了些。姓岳的抓住了这个机会说我有意“磨洋工”，拿起他监工的板子，照我头上就打。打的我眼角直流血。另外一个姐姐（林玉妹）为我辩护，也挨了板子。我气愤不过，就说：“你管天管地，还能管我拉屎放屁！”这句话刚说出口，姓岳的就更凶地骂道：

“小兔崽子，我就是要管你这个‘磨洋工’！”接着雨点似地板子落到我的身上、头上，不一会儿，我就被打得不省人事了。

当我被一阵剧烈的疼痛疼醒时，已经倒在三舅家里了。

第三天早晨，我忍着伤痛去上工。可是，狠心的

資本家已經把我开除了，并且还把我上半个月的工資全部扣下，一个子儿也不給。我气得沒法，就和姥娘一起上义和路派出所去告状。但那时的官府，与有錢人合穿一条褲子，一个鼻孔出气，我們穷人就是再有理，也不会得到一星半点好处。派出所的警察，起先根本不理我們。后来他无意中抬头发现了我，馬上起了歹心，調戏我。我一看情况不妙，撒腿就往家跑。状沒告成，反惹了一肚子气。当天夜里，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想起了日本鬼子統治时的种种不幸遭遇，想起了現在的种种苦难，使我更了解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是一个样，我恨死他們了。正在这时，突然一陣敲門声，原来是派出所那个恶警察“查戶口”来了。我知道这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就赶紧从后窗口逃跑了，一整夜也沒敢回来睡觉。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成天抓兵，三舅为了躲兵，白天藏在下水道里，晚上才敢回家。有一天，他刚从下水道出来，就被发现了，当时就抓走了。我和三舅母、姥娘，只好去投靠二舅。

二舅是个本小利微的生意人，由于受不住当时国民党抓兵营一个姓左的副官的欺榨勒索就逃跑了。我和三舅母、姥娘到二舅家时，正好遇到这个左副官到

二舅家來逼錢。二舅不在，二舅母遭了他的污辱，並且把二舅母戴的耳環子也給逼去了。臨走時，他忽然看見了我，就像一條毒蛇一樣，伸出了沾滿毒液的舌頭，說：“這兩條辮子和這個小白臉還值幾個錢嘛，送給我當個小太太吧！”我聽了這話，又恨又怕，趕緊躲到姥娘背後，姥娘上前哀求道：“她還是個孩子，不懂事……”沒等姥娘說完，他就一把推開姥娘，吼道：“你他媽囉嗦什麼，老東西！”接着，他又對我吼道：“去不去？”我想起了二舅、三舅被他們逼走的仇恨，心里怒火直冒，憤怒地大喊：“不去！不去！死也不去！”“你這個賤貨！我告訴你，你活着是我左某嘴邊的肉，死了也是我左某手中的鬼！今兒個，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姥娘怕把事情鬧大了，就跪在地上向他求情說：“今兒個太倉促了，也沒有準備，又惹你先生生了氣。這樣吧，過幾天我們準備準備，把人給你直接送到新兵營去。”這時鄰居和樓上的教員李先生也紛紛講情，這家伙哼了一聲：“五天以後再算賬，今個先饒了你！”說完，揚長而去。

這個姓左的家伙是個有名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被他搶去做“小太太”的姐妹，不知有多少，都在痛

苦和屈辱中死去了。

我陷入了絕境，只好决走走絕路了。在左某走后的第四天夜里，我一个人偷偷地上了楼，打开了窗戶，想跳楼自杀。我刚要往下跳，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辮子。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楼上的李先生。他劝我說：“你小小的年紀，可不能走这条路啊！”我說：

“不走这条路，也沒有別的路可走了。”他又說：“你們怎么不往解放区跑呢？也許能找到条活路。”

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意宣传，我对解放区、八路軍有些怀疑，但在李先生的鼓励下，我們全家还是收拾了一下东西，当天夜里就赶到供西街（現在的紅旗街）卡哨，天一亮就逃出了这个地獄一样的黑暗城市。

（五）

一九四八年六月初，我們逃到解放区——大屯县，又在“难民所”里見到了二舅。原来他是在逃跑的第二天就到了这儿。我們全家团聚了，分外高兴。我們一同往前走，一路上到处都能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欢騰、悅耳的歌声。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蓝天上的太阳是这样温



暖，脚下的道路是这样的宽广……。我走着，跳着，笑着，不知不觉地也跟着哼起“解放区的天”来了。

我們一路上受到了許多照顧，八路軍幫我們推車子，有的战士还背着我姥娘……这些，深深地感动着我們，也解除了我們心中的疑慮。

在解放区我先后参加了妇女会、演戏队。十七年来，我第一次挺起腰板走路了，十七年来第一次欢乐地扭起了秧歌，唱起了心中的歌曲，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唱“东方紅”的情景，当时我眼里含滿了泪水，心激动得直跳，我唱不尽心中对党和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的热爱。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长春解放了，我們又回到了长春。

一九五〇年我考上了长春市文工团，从此以后，

我一直生活在党的身边。党不断地培养我，教给我学习文化和政治。在党的苦心培养和教育下，我由一个不懂事的苦孩子，渐渐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清楚地知道了：什么是剥削和压迫，什么是阶级斗争和革命，我的政治觉悟一天天有了提高。一九五一年，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三年，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組織上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专业上培养我，多次地送我到北京等地的文艺团体和舞蹈編导班学习，使我逐渐能够担任和完成一些較重要的角色和工作任务。虽然我做的工作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相差很远，可是党和同志們给了我很多的荣誉：多次授予我长春市妇女模范、先进生产者的称号，又給我記了两次功，并选我做市人民代表，讓我出席全国文代会，等等。

在全国文代会上，我看到了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当时，我禁不住流出了幸福的眼泪。每当我想到毛主席和我握手的幸福情景，就使我充滿了前进的、革命的决心和力量。

随着祖国各項事业的发展，我們文艺事业也蓬勃地发展。一九五八年，吉林省歌舞剧院建立了，由于

党的需要，我先后担任了本院的舞蹈队队长、辅导科科长、舞剧团副团长等职，现在任我院艺术室的副主任工作。

像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里牛马不如的苦孩子，今天能够成为党的一名文艺战士，这是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加强政治和文艺理论的学习，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服务。

祖国天天富强，我们个人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生活在欢乐和幸福中。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两个世界。

每当看到我的孩子坐在澡盆里一边洗澡、一边用小手扬着水玩的情景时，我不禁想起了旧社会在洗衣盆里被淹死的婴儿……。

每当听到我的孩子们坐在小板凳上，唱着“我是小女工，开会上北京”的歌子时，我不禁又想起了我当童工和红秋姐姐递我小板凳的情景，想起红秋姐姐和无数牺牲的姐妹们……。

每当我吃大米饭的时候，每当我看到墙上年画的时候，我都要想起过去“经济犯”的凄惨遭遇和悲惨的年关……。我深深感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今天的幸福生活，正是当年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不能让先烈的血白流，我永远也不能忘掉过去，在我的手上、头上、背上至今还留有旧社会给我造成的伤痕；特别是在我的心中，埋藏着对旧社会无比的仇恨，它时刻在提醒我，警告我：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为了不忘本，我给大女儿起名“晓红”，二女儿起名“晓秋”，这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为我死去的红秋姐姐，另外也是为了使孩子们知道我们当年受过的压迫，让她们了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让她们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使她们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热爱党和毛主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永不忘本，做个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